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

朱佳木◎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

朱佳木◎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朱佳木 江苏南通人，中共党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秘书、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现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著有《陈云年谱》（主编）、《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专著）、《当代中国理论问题十二讲》（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纵横谈》（专著）、《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论文集）、《论陈云》（文集）、《地方志工作文稿》等。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作者：朱佳木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5月

ISBN：9787520122962

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编委会

总　　编　李慎明

执行主编　陈之骅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

马援　王立强　王镭

邓纯东　吴恩远　张树华

侯惠勤　姜辉　秦益成

晋保平　程恩富　谢寿光

樊建新

我们愿做报春鸟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总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慎明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套普及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理论读物，又是我们集中院内外相关专家学者长期研究、精心写作的严肃的理论著作。

为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每册书的字数一般限定在4万字左右。这有助于读者在工作之余或旅行途中一次看完。从2012年到2022年这十年间，这套小丛书争取能推出100册左右。

这是一套“小”丛书，但涉及的却是国内外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主要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重要观点的创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反面角色），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当今理论实践及发展趋势等，兼以回答人们心头常常涌现的相关疑难问题。并以反映国外当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兼及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普及读物更难撰写。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极有限的篇幅内把

立论、论据和论证过程等用通俗、清新、生动的语言把事物本质与规律讲清楚，做到吸引人、说服人，实非易事。这对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无疑是挑战。我们愿意为此做出努力。

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总根源，就是东欧剧变和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的急遽分化。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但在笔者看来，再过八年、十年，国际金融危机也走不出去。这主要是因为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的高科技革命和新的生产工具的诞生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贫富两极分化。这正如马克思所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1]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从总体和本质上说，资本与劳动的各自致富，是一个跷跷板的两头，绝不可能是共富。资本愈是富有，广大劳动群众则必然愈是贫穷；广大劳动群众愈是贫穷，社会的有效需求则必然是愈加减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全球范围内广大民众愈加贫穷，社会的相对需求急遽减少。我们还可以做出这样的预言，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智能机器人会更多地挤占现有的人工工作岗位，无人工厂会雨后春笋般地在世界各地涌现。这一进程，可能要比我们常人所想象得还要快得多；其覆盖面，可能比我们常人想象得还要更为广阔。但资本都不雇佣工人了，普通百姓都没有工资了，谁来购买这些物美价廉的产品呢？各垄断资本集团之间追寻高额利润的残酷竞争——引发新的高新科技发展特别是智能机器人的普及——导致新的工人大量失业——社会相对需求减少——引发更多

工厂破产和工人失业——加剧减少新的社会相对需求——进一步触发新的工厂的破产。以上铁的逻辑必然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不断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全面危机，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即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被极少数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根本无法摆脱。随着这一矛盾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可以断言，更大的金融灾难必将在紧随其后的一些年内接连爆发。

凭栏静听潇潇雨，世界人民有所思。这场危机推动着世界各国、各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开始进一步深入思考。可以说，又一轮人类思想大解放的春风已经起于青蘋之末。然而，春天到来往往还会有“倒春寒”；在特定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也有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更大的灾难，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可能步入新的更大的低谷。但我们坚信，大江日夜逝，毕竟东流去，世界社会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可能又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春天。我们这套小丛书，愿做这一春天的报春鸟。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目前，中国各族人民正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沉着、坚定地迈向无比美好的未来。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无限美好的信心。

现在，各出版发行企业都在市场经济中弄潮，出版社不赚钱决不能生存。但我希望我们这套小丛书每册定价不要太高，相关方面在获取应得的适当利润后，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读得起才好。买的人多了，薄利多销，利润也就多了。这是常识，但有时常识也需要常唠

叨。

敬希各界对这套丛书进行批评指导，同时也真诚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各方面的人士为我们积极撰稿、投稿。我们选取稿件的标准，就是符合本丛书要求的题材、质量、风格及字数。

2018年5月5日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268页。

前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又十分重视历史的民族，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秀文化传统，也十分重视对历史，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学习、研究与应用。历届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都就学习历史知识、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发过文件、下过指示、作过讲话。比如，毛泽东说过："读历史是智慧的事。"[1]"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2]"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邓小平也说过："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4]

习近平总书记和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同样非常重视和强调学习历史知识、总结历史经验，曾就这个问题有过多次讲话，作过大量论述。他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5]"要加强对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学习，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得到定力。"[6]"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

一个重要原因。”要“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7]他还反复强调：“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8]

由于所处时代特点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和老一辈革命家相比，在强调重视历史时的侧重点上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一般来说，老一辈革命家论述比较多的是研究党史的意义、态度、方法、重点，以及党史的基本过程和经验教训，而从习近平同志2007年到中央工作十年来，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后担任总书记五年多来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看，他对这些问题虽然也有很多论述，但论述更多的或老一辈革命家过去不大论及而他较多论述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国史的学习和宣传。过去一些年，由于新中国的历史还不长，国史研究还没有开展或开展时间不久，因此，领导人强调学习历史时，往往不大提到国史。然而，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时，新中国历史已经有了58年，国史研究也已开展了近30年。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历史经验的总结时，往往是把党史和国史并提的。比如，他指出：“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9]他还说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10]

其次，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过去很长时间里，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蔓延的错误思潮主要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

化，以及鼓吹私有化和彻底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宣扬“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而旨在动摇人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信任、信心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还不十分突出。但自它在苏联解体、苏共下台过程中起到显著作用后，其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也逐渐泛滥开来，而且日益猖獗，甚嚣尘上。这个现象，引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警惕，以至于每当强调要重视历史、要树立正确历史观的时候，总是直接点名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为批判的靶子。比如，党的十八大刚开过不久，他就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培训班上讲话（以下简称“一五”讲话）中指出：搞历史虚无主义，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针对历史虚无主义作出的论述、提出的对策，就更多了。

最后，对树立正确历史观的提倡。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化、精神、道德对经济、物质、社会的反作用，也非常重视人们的历史观在文化、精神、道德领域的重要作用。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1]“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12]“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13]“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

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4]他强调：“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15]“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要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形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比如，像戚继光抗倭、冯子材抗法、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这些历史，都要深入挖掘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创作更好更多的精品力作，以长中国人志气，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16]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一部分，专门列有一个名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小节，其篇幅不长，却有一句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没有的话，即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17]。由此不难看出，他对于树立正确历史观在思想、文化、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视。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是存在一定内在联系的。因为，要正确学习和宣传国史，就要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要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就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就不能脱离对国史的学习和宣传，不能回避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抵制和批判。

古今中外的事实无不说明，对历史特别是国家史的解释，历来是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争夺、较量的重要领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总是高度重视对历史的解释，并把它视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要推翻一个政权的阶级和政治力量，也

十分看重对历史的解释，总要用它说明原有统治的不合理性。这是一个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社会现象，区别只在于进步的阶级和政治力量顺应历史的前进方向，对历史的解释符合或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反动的阶级和政治力量悖逆历史前进方向，对历史的解释总是难以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之所以肆意扩散，原因就在于国内外敌对势力从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过程受到启发，发现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拿历史问题做文章，对社会主义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作合乎他们需要的解释，是一个既花钱不多又效果明显的办法。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8]这就告诉我们，进行武装斗争需要武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同样需要武器，只不过后者需要的是思想武器。这种武器与物质的武器不一样，要做到有效，必须能够说服人，而要说服人，就必须彻底，要彻底，就必须抓住事物的根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样的武器。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其中包含大量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政治本质和实质的揭示，以及有关同这股思潮作斗争的论述。这些论述不仅旗帜鲜明，而且鞭辟入里，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我们要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掌握和运用这一思想武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5]《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

[6]《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40页。

[7]《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

[8]《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

[9]《人民日报》2013年3月3日。

[10]《人民日报》2013年6月27日。

[1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1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14]《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15]《人民日报》2015年12月31日。

[1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版

社2017年版，第34～35页。

[17]《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一 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精神揭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

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说过："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中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1]邓小平当年批评的这个问题，后果在近些年已逐渐显现，其中一个特殊现象是，在所有涌入我国的哲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领域的西方思潮中，有一种在西方国家并不时兴，只在它们的敌对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流行，这个思潮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原本是欧洲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流派，主张人类生存没有意义，没有目标。后来被引入史学领域的虚无主义，主张人类历史没有规律可循，也无所谓本质和主流，人在历史潮流中更是无可选择、无能为力，决定历史走向的是地理、气候等客观环境。这个理论正确与否，人们完全可以在学术层面继续讨论和争论。然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主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却并非这种学术性的思潮，我们同它的关系也不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

那么，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思潮呢？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一五”讲话中就一针见血地给予了回答。他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2]在201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会上，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由此可见：

第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由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制造和鼓吹的，本质上用于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一种政治工具；

第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要害在于通过攻击、丑化、污蔑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历史，搞乱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心；

第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第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是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理论界、学术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文艺界，以及网络舆论界都有表现，在近代史、党史、国史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虚无中国近代以来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及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正义性、合理性、合法性，污蔑一切反对外国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的

斗争，声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外因造成的，违反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破坏了中国的社会发展；相反，美化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大唱赞歌。例如，说林则徐虎门销烟导致了鸦片战争，因此是历史的罪人；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文化的大荒谬、社会大灾难；说孙中山是在中日冲突的背景下寻求日本支持进行反清活动的，因此不能说是爱国的；说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时，中国人并不认为那是中国的；说五四运动是破坏性运动，使中国走上了歧途；说中国共产党是少数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秘密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是靠拿卢布、搞阴谋、耍诡计、窃情报而取胜的；说抗日战争主要靠的是“国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只打死851个日本鬼子”，没起什么作用；说新民主主义不仅不应当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它本身就有问题，是和“宪政民主”、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而凡是被帝国主义“租借”“割让”“占领”的地方，却被说成是经济发展快、社会繁荣文明的样板，说如果中国早些被殖民化就好了，如果再当500年殖民地就更好了；说日本并没有一个灭亡中国的计划，它不过是想通过中国抗衡西方列强；说李鸿章向列强妥协是为了救中国，是替人受过；说近代买办是沟通中西交流的桥梁，是历史的进步力量；说中国的地主都是勤劳俭朴的人，是善于经营的农村精英；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并没有对中国经济进行垄断，也没有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互勾结，蒋介石更是中国现代第一伟人；说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从民族利益着想的，是为了使沦陷区的中国人有自己的政府；说刘文彩和文艺作品中的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等，都是对农民很好的大善人，甚至杀人如麻、血债累累的马步芳宅院也被辟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马步芳公馆”，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击毙的张灵甫也被吹捧为民族英雄，家乡居然建有他的陵园。

2.虚无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进步的伟大意义，否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进步性，抹杀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夸大新中国建立后历次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把新中国历史描写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一切为中华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立、建设献出生命、做出贡献的烈士、英雄、模范人物。例如，说1949年10月1日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标志；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是在国际斗争中的错误选择；说美国出兵朝鲜是反侵略，中国抗美援朝是上了苏联的当，耽误了国内建设和解放台湾，得不偿失；说土改、合作化运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统统错了，反右派斗争更是一场大阴谋；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中国经济长期落后的根源，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不对，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更是领导人主观意志的产物，公私合营是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无理剥夺，实行这些举措使中国走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岔路，还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甚至五千万人；凡是肯定“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科技、国防、外交战线上有成绩的，都被扣上“左”的帽子，被说成是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翻案；并说搞“三线”建设是对国际形势的误判，是劳民伤财；说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是打肿脸充胖子；说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是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没有是非可言；等等。另外，抹黑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诽谤从李大钊到十八勇士、狼牙山五壮士、赵一曼、刘胡兰、江姐、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毛岸英等烈士，以及新中国树立的雷锋、时传祥、草原小姐妹、少年英雄赖宁等榜样。就连刺杀大汉奸的国民党女特工郑苹如，也被他们丑化。

3.虚无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一致性，或者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或者用改革开放

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例如，说中国历史只有前帝制时期、帝制时期和后帝制时期；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如同1840年的鸦片战争一样，是划分中国历史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使中国回归了世界文明；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说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所谓专制“皇帝”，毛泽东“使中国陷入普遍贫穷”，邓小平“把中国引向了两极分化”，等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种种表现清楚地表明，它的指向是十分明确的，即只“虚无”革命的历史、共产党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而从不“虚无”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可见，这股思潮不过是以“重新评价历史、书写历史”和“还原历史”为幌子，以“碎片化”和“恶搞”“戏说”历史为手段的政治思潮。按照这股思潮对历史的叙述和解释，不仅中国近代史和党史国史要推倒重写，而且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等观念也要推倒重塑。其结果，势必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侵略有理，而革命有罪、劳动人民有罪、中国共产党有罪、新中国有罪。那样，千千万万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家有主权、民族有尊严、人民做主人的历史就成了罪恶史、黑暗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有什么值得中华儿女骄傲、自豪的？！还谈得上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只要把近年来攻击、诬蔑革命领袖、烈士英模的现象联系起来，尤其再联系苏联解体之前出现的类似现象，我们就很容易看清，反复说这些话、造这种谣的人，绝不是在消遣、在调侃，而是在自觉不自觉、明里暗里接受敌对势力的指挥，同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打意识形态的“无硝烟战争”。当年苏联解体之前，就曾出现过类似现象。例如，诽谤列宁是德国间谍，攻击斯大林是恶魔，造谣卓娅是因

为烧老百姓的房子而被群众扭送给德军的，诬蔑用身体堵德军碉堡枪眼的马特勒索夫是少年犯，等等。现在，这股势力又想故伎重演，把他们那一套伎俩拿到中国。这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股思潮的来源、本质、目的、要害、核心、作用的分析判断，都是非常准确、十分深刻的。

习总书记说，历史虚无主义制造者中有国内敌对势力，也有国外敌对势力，这个判断完全正确。对此，只要看看以下几点就会十分清楚。

第一，看看革命导师和我们党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都是怎么论述的。列宁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支。"[4]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强大"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关系牢固有力"[5]。邓小平也说过："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6]他还指出："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7]

第二，看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自己都是怎么说的。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早在1945年就说过："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方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8]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过："冷战的目的不是占

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的目标更微妙，更为广泛，更为彻底。”“我们将使用的方法通常称为‘心理战’……所谓‘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斗争。”[9]“在宣传上花一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说过：“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我们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要和共产主义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10]

第三，看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是怎么做的。据透露，二战之后，仅美国为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就花了十几万亿美元。它依托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办电台、拍电影、出书刊、搞交流、给资助、评奖项，近些年又利用从中国跑到海外的“民运”分子建网站、编信息，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输送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内的意识形态。把它们梳理一下，可以看出这些措施主要有四个：一是控制和利用新闻媒体。二是通过电影、电视剧进行文化扩张。商务印书馆在2015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名为《好莱坞内部的中情局——中央情报局如何塑造电影和电视》的书，作者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基督教大学副教授特里西娅·詹金斯，她在书中对此作了充分揭露。三是通过和社会主义国家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合作交流，输出意识形态，培植反共势力。四是设立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奖项和网站，奖励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分裂分子，“抬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雇用职业写手，专门编写赞美西方、丑化中国、给历史翻案和纯属谣言的段子，精心打造为他们服务的网络大V、公众偶像。

第四，看看污蔑、抹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消息、书目、报刊、网站都是在哪里编造、出版、推销、建立的。例如，采用造谣手段恶毒攻击毛主席、周总理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叫父亲太沉重》等书，都是在境外由情报机构策

划炮制出版，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拿到国内传播。正如邓小平所说："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11]

第五，看看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分裂祖国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往哪些地方跑，得到哪些势力支持、邀请、收留和奖励的。前些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撰写的一本名为《黯然失色——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的书，由中华书局在香港的副牌东方出版社出版并在内地发行。该书专讲他们1986～1991年在世界各地进行的重大间谍活动，其中提到中国"八九"政治风波后，他们帮助被中国公安机关通缉的动乱分子出境的活动，代号为"黄雀行动"。西藏分裂势力头目达赖、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热比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刘晓波等人，都得到了西方反华势力的收留、支持、奖励，这些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内地一些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攻击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也是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背后有西方势力在为他们撑腰。

既然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要对我们搞"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那一套，我们当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做到"护己之国，必先卫其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12]"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13]我们应当站在这样的思想高度，认识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的意义，坚决捍卫我们民族的历史、革命的历史、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并把

它作为维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措施。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3]转引自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见《人民日报》2013年7月22日。

[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326页。

[8]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9]李慎明：《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20周年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292页。

[10]周新城、张旭：《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一颗灿烂红星的陨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12]《人民日报》2015年12月31日。

[1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4页。

二 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精神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谬论

历史虚无主义为了歪曲和否定我们的党史国史，主要采用两种手法，一是编造谎言，二是制造歪理。我们在同这股思潮作斗争时，也需要以两手对两手，一方面揭露他们的谎言，另一方面批判他们的歪理。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用真理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1]。

编造谣言，散布流言蜚语，搞三人成虎、无中生有、无风三尺浪的伎俩，是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心理战、文化战的惯用伎俩。今天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鼓吹者要混淆视听、误导群众、搞乱人心，必然也会使用这个战术。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对于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要想识破谣言，还是需要有人出来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习近平总书记就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各种敌对势力就是想利用这个逻辑！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2]“对恶意攻击、造谣生事，要坚决回击、以正视听。”[3]他还表扬说：“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股诋毁、恶搞、丑化英雄人物的歪风，我们一些主流媒体及时发声，用史实说话，为英雄正名，发挥了弘扬正气作用。”[4]因此，我们对谣言不能小看，更不能采取“鸵鸟”政策，而应当及时回应，做好辟谣工作。

就拿所谓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仅打死了851个日本鬼子的谣言来说，稍有近代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相信，但缺少历史知识的人看到它说得那么具体，数字精确到个位，很容易信以为真。针对这个谣言，有人找出日本军方战后编撰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其中写道，仅1941年一年，在华北地区被八路军和游击队打死的日军就有2352人。至于在其他地区、其他年份被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消灭了多少日军，书中没说，但仅此一例就可戳穿那个所谓仅打死了851个日本鬼子的谣言，使上当受骗的人警醒起来。

前一段时间还有人造谣说，《毛泽东选集》1至4卷160余篇文章中只有12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经他修改的也只有13篇，其他全是别人写的；还说毛主席诗词中的《沁园春·雪》出自胡乔木的手笔；等等。对此，中央档案馆毛泽东档案的保管人员站出来公开发声，用事实作出了反击。胡乔木同志的子女也出面辟谣，使这个谣言从此销声匿迹。另外，还有人造谣说，陈云讲过，“毛主席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对此，陈云的子女也站出来辟谣，澄清了事实，使人们了解了事情真相。

前一阵子，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的谣言影响很大。一开始，这个谣言说“饿死一千万”，后来逐渐加码，从“两千万”一直说到“五千万”，有人还煞有介事地以所谓“统计数据”和“县志记载”为证，在内地发文章，在香港出专著，说“饿死了3600万人”，把它作为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重磅炸弹”，此举受到国际反华势力“叫好”和“褒奖”。有些群众对那段历史不了解，看到这个谣言讲得这么“翔实”，有关部门又不出来做“坚决回击、以正视听”的工作，很容易信以为真，或者将信将疑。然而，要对这个谣言的所谓“证据”进行辨伪，不下一番功夫是不行的。近来就有一位长期从事统计学研究和教学的教授，下了这样一番功夫。他凭着学者的良心，一本本查阅了谣言制造者声

称依据的县志，发现上面实际记载的只是那一时期当地人口的死亡数，并没有说人是怎么死的，更没有说人是饿死的；而且，许多志书连死亡数字都没有，所谓“饿死”了多少人，纯属凭空捏造。这位教授还运用统计学的专业知识，对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统计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考证，指出所谓“饿死上千万人”的说法，来源于把那个时期按照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应达到而未达到的人口数，与因为生育率下降等造成的人口减少数混淆了；也把由于年老或营养不良、医药不足等造成的自然死亡数，与饿死人的数字混淆了。而且，就连根据统计公式计算出来的那个时期的人口减少数本身，也忽略了当时历史背景下，几千万人口由农村招工进城又由城市下放农村的过程中，有许多的城市户籍被注销，而回到农村却漏报了户口，1962年后普查人口时又作了补报等实际情况。经过这番认真核对和考证，所谓“饿死3600万人”的弥天大谎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人们看清了谣言制造者肆意夸大那一时期问题的严重程度，以迎合国外反华势力需要的丑恶嘴脸。

不过，与谣言相比，对群众思想影响更大更深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制造者散布的各种歪理邪说。我们要战胜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除了要做揭穿谣言、以正视听的工作外，更重要的工作应当是从理论层面揭露这些歪理邪说的荒谬性，帮助群众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分清是非。在这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掌握和运用这一思想武器，对于同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歪理邪说作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下，试举几例说明。

1. 运用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思想，批判所谓中共成立是“外因促成”、革命胜利“纯属偶然”、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走了弯路”等谬论。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散布所谓“中国共产党是用俄国卢布起家的”，“打败国民党靠的是情报工作”等谬论。言外之意是，当年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成熟，工人阶级力量很弱小，搞共产主义革命缺少基础，如果不是靠外力推动和靠情报工作等偶然因素，共产党要建立、要胜利都是不可能的。这些谬论是典型的历史唯心论，有的说辞本身就是从当年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历史垃圾堆里捡来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正面作出过许多论述。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我们党建立的历史背景和奋斗历程，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在“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5]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壮大，原因主要是中国社会产生了这种需要并具备条件，依靠的主要是人民的支持和自身战略、策略的正确。所谓中国共产党靠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情报工作才成立和胜利的观点，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不错，我们党在成立时，确实得到过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帮助，但这不等于没有它们的帮助，我们党就成立不了。

第一，说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弱小，只是相对于农民阶级而言，其绝对数量并不少，力量也不小。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于1847年，那时，英国工人阶级不过400多万人。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那时，全俄产业工人也不到300万人。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在1914年一战爆发时，就有100万人以上，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更达到了200多万人；而且，算上与机器大工业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的非产业工人，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已多达400万。更应当看到的是，与中国的资产阶级相比，中国工人阶级的年龄、资格更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性也更强。早在1915年，上海工人就举行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政治集会，人数有三四万人。这说明，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二，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史实说明，1920年俄共（布）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秘密来华之前，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就已经在酝酿建党问题了。在与共产国际组织毫无联系的情况下，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新民学会骨干蔡和森，给国内的毛泽东写信，也提出了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可见，那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即使没有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或迟或早也会建立的。

第三，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的革命开始时都得到过外国的支援，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就接受过国外的援助。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西班牙、荷兰分别给美国800万美元、65万美元、180万美元，欧洲前往美国的志愿者达到7000多人，其武器弹药大量来自法国。中国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也接受过共产国际的援助，而且得到的援助比共产党多得多。所以，某些国家的革命得到过外力的支援，并不能说明这些革命如果没有外力支援就不会发生。

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内因是主要的，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是次要的。毛泽东1943年在谈到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时就曾说过：“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6]

至于说情报工作，我们党内在隐蔽战线斗争的英雄们，例如战斗在国民党心脏的钱壮飞、李克农、熊向晖、沈安娜等，以及破译敌人

密码的电台人员，确实为革命胜利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国民党同样向共产党内部派遣过许多潜伏特务，而且共产党里还有一些掌握重要机密的负责人，如顾顺章、张国焘等，叛变到了国民党方面，当了特务。为什么他们就起不了那么大作用呢？可见，国共斗争胜负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情报工作的优劣，而在于人心的向背。据说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就在国民党的军事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当时国民党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心完全消失。他的话道出了国民党最终失败的部分真理。否则，仅仅靠情报工作，共产党是不可能战胜物质上比自己强大不知多少倍的敌人，也是不可能由几十人的小党逐渐成长为不知壮大了多少倍的大党，更是不可能存在近100年并且还在持续不断向前发展的。

历史上解释中国革命及其胜利原因的奇谈怪论有很多。比如，毛泽东在1949年为新华社写的《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就批驳过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关于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在于“人口太多”和“西方影响”的谬论。他说：“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7]至于说“西方影响”，毛泽东讲，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确实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里，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都抵挡不住帝国主义，“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8]不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

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9]他还不无讽刺地写道：艾奇逊之流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10]。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除了否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还否定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并且总喜欢拿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件事大做文章，说什么这是毛泽东个人急于搞社会主义的结果，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使中国“走了弯路”，是“导致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这个观点一度被炒得很热，似乎中国压根就没有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就不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从正面作出过回应。

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事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以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给予过高度评价。《历史决议》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结果整个来说，“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1]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12]江泽民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13]胡锦涛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4]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对于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件事是这么说的，他说：“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

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5]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他又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16]他在这些论述中使用了一些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针对性的词语，例如“不失时机”、“创造性地完成”、“成功实现”等，而且还不无所指地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由此可见，他有关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评价，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谬论的批驳。

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谁决定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谁起最终决定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基本区别。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7]列宁也说：“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

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做这些关系的根源”。[18]对于中国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我们同样不能从人们的头脑中、思想中去寻找，而应当深入研究中国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从中国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中去寻找。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在党成立时就是十分明确的，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毛泽东早在革命初期就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先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又根据当时中国经济中的现代工业比重太小，而且资金匮乏、人才奇缺，不具备马上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条件的实际，设想先用10年到15年时间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例如，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讲话说，工业生产在全国胜利后，顶多占国民经济的10%～20%，“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毛泽东插话说：“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产量顶多占百分之十至二十。”[19]当刘少奇说“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时，毛泽东又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20]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指出：抗日战争前，中国现代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此，“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21]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又多次讲，工业化需要巨大资金，

我们要靠发展农业、轻工业，靠人民节省，为重工业积累资金，因此要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这个过程“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22]。到那时，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实行工业国有化。用他的话说，那“是一天早晨的事”。[23]

之所以说我们当时在资金、人才方面都不具备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条件，还可以从以下具体数字看。

首先，从资金方面看。要发展工业化，需要先进行工业基础建设。拿“一五”计划来说，全部建设预算为766亿元，相当于7亿两黄金，其中基建投资占56%，仅进口设备就要用150亿元。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大量“赔款”，国库几近空虚。民国时期又连年打仗，剩下的黄金、美元，大部分也在新中国成立前被国民党运往了台湾。在1952年，我国结存外汇只有1亿美元。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能力十分落后，在短时间也很难拿出数量、质量上都能满足出口换汇需要的农产品和轻工业品。

其次，从人才方面看。要发展重工业，要进行工业资源勘探、厂矿技术设计和企业管理，这些都需要有相应人才。但中华民国从成立到垮台的三十多年间，从高校毕业的学生总共才21万。其中，工科毕业生3万人，硕士200人，博士一个没有，地质专业毕业生只有200多人。

正是以上原因，促使党中央领导人最初考虑，先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相应地实行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待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条件成熟时，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然而，自1950年底起，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促使党中央改变了原先的设想。

形势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件事情上。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0年6月，朝鲜发生内战，美军立

即封锁台湾海峡，入侵朝鲜半岛，并乘机越过三八线，迅速向中朝边界推进，使我东北重工业基地暴露在美军炮火之下，也使我国随时有被美军入侵的危险。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新生政权，党中央决定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志愿军入朝初期，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把美军打回到三八线以南。然而，这毕竟是志愿军凭着血肉之躯和勇敢精神，在同用钢铁武装的美军比拼，凸显出中国加快现代国防工业及基础工业建设的紧迫性。

抛开16国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不说，单看那时中美两国的国力、军力，相差就极大。据有关资料显示，1950年中美双方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美元对2800亿美元，相差27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4美元对1600美元，相差65.7倍；钢产量60万吨对7500万吨，相差124倍。中美双方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军力对比是：军费开支10亿美元对400亿美元，相差39倍；消耗物资560万吨对7300万吨，相差12倍。中美双方在朝鲜战场上的装备对比是：中方刚参战时，没有一架飞机，苏联在两个月后出动了空军，但只限于在中朝边界作战；战争后期，中方有了空军，但只有歼击机，且数量有限，只能保护后方和运输线，无法配合地面作战。另外，中方刚参战时只有一个高炮团，共34门炮，其中12门摆在鸭绿江中方桥头，入朝作战只有24门。而美军战争初期就有飞机1100架，最多时达到4000架。中方自始至终没有军舰，而美军总共7个舰队中，有4个舰队共300艘军舰前来参战。中方战争初期没有坦克，而美军总共有2400辆坦克，一个军就有430辆。中方的一个师只有一个山炮营，而且是小口径炮，而美军一个师仅大口径榴弹炮、加农炮就有432门，共有大炮5万门。中方的一个军只有几十辆汽车，最多的一百辆，而美军一个军就有汽车约7000辆。中方入朝时，每个军只有几十部电台，勉强装备到营，而美军一个师就有1600部电台，无线电通讯可以直达班排。中方士兵

使用的武器，基本是老式步枪或缴获日本的“三八式”，每个班顶多一把冲锋枪，每个排顶多一挺轻机枪，而美军士兵用的都是新式步枪和轻重机枪。双方武器装备的这种差距，无疑会影响到“一五”计划制定过程中对计划重点的考虑。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鼓吹者为了否定新中国的历史，也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抗美援朝。他们以发现新档案为由，说什么“朝鲜战争是北朝鲜侵略南朝鲜，美国出兵是反侵略，中国抗美援朝是帮助侵略者”；“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是为了继续霸占东北，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上了苏联的当”；“抗美援朝耽误了解放战争，影响了国内建设，损失巨大”；等等，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历史决议》和历届党中央都作出过高度评价，而且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否定的声音给予了正面回应。对于抗美援朝的原因，他这样说：“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杜鲁门政府悍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和乡村，把战火烧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在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毅然决然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果敢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使命。”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性质和意义，他这样说：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弘扬和光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壮丽凯歌”“进一步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24]他的上述一席话，显而易见是对种种污蔑抗美援朝言论的有力回击。

第二，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发展重点放在了重工业上。从1951年下半年起，有关领导和部门就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据薄一波回忆，编制“一五”计划之初，围绕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国究竟应当从何起步的问题，“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25]。就是说，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关于这一点，从毛主席在1951年12月初的一段批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他写道：“从1953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20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26]

第三，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的“一五”计划建设。1952年8月，中央派周恩来、陈云等组成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就请求苏联帮助中国进行“一五”计划建设一事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在工业资源勘察、工业设备设计和制造、技术资料提供，以及派遣经济、技术顾问和接收留学生、实习生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援助。之所以会有这个结果，笔者认为与抗美援朝也有很大关系。据美国公布的数据，美军同期阵亡加失踪为6.2万人，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阵亡加失踪合计116万人。如果算上负伤被俘，美军损失17.3万人，其他军队一共损失225.6万人。但我军损失也是巨大的。据有关部门统计，志愿军阵亡11.5万人，非作战减员3.8万人，共15.3万人，加上受伤医治无效死亡，民工牺牲，由民政部核准的志愿军烈士共19.7万人。这些年轻的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巩固，也换来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为增强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9月24日，周恩来、陈云等回国，党中央当晚召开书记处（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并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据薄一波回忆，毛主席就是在那次会上提出：“我们现在

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薄一波还说：“对于他的论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2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指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28]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这三件事情之间是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的。首先，抗美援朝战争加剧了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紧迫性；其次，“一五”计划的制定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具有了现实性；最后，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一五”计划建设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具有了可能性。正是这一切，促成党中央作出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

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什么必须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是因为：

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使资源匮乏问题更加突出。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一五”计划建设虽然使我们有了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条件，国民经济的恢复、国营经济在工商业中比例的上升、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也使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了一定依据，但这些并不等于说过去经济落后，资金、物资、人才奇缺的问题跟着解决了。1952年，重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虽然上升到15.3%，但只比1949年多了7个百分点。我国粮食历史最高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1953年的产量虽然提高到3300亿斤，但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了。一是农民自身需求多了；二是向农村灾民、菜农、渔牧盐林民约1.4亿人的返销多了；三是出口换设备用得多了，约用了30亿斤。因此，粮食的商品化率仍然很低，供给城市人口、财政开支的只有860亿斤。另外，资金和人才的缺口更大。在资金方面，苏联虽然先向我们提供了年息一分的3亿美元贷款，后来又提供了年息两分的5亿卢布贷款，但“一五”时期用于基础建设的投资为427亿元，这些贷款仅占工业基建投资的3%多。在人才

方面，苏联虽然答应派专家、顾问3000多人，但“一五”时期仅工业交通战线就需要技术人员39.5万名，而1953年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仅有28.6万名，缺口11万人。

第二，要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只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社会制度和国际条件都决定了搞工业化的资金、物资只能来自内部积累。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有限的物资（特别是粮棉钢煤）、资金、人才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国家手中，再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

第三，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国有化、集体化。因为在当时条件下，物资、资金、人才都十分紧张，如果计划只在国营企业有效，而在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农民那里不起作用，计划便很难落实。因此，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对农业实行合作化。

第四，接受苏联等国的援助加快了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步伐。这是因为，援助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如果我国的很大一部分工商业和农业还实行市场经济，很可能出现人家要按计划交付设备，而我们这里由于种种原因接受不了；我们按计划应当偿还人家的物资，却由于种种原因出口不了。所以，要把援助与受援衔接好，我们也需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在体制上接轨。

做到以上这些，当然就不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可见，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并非毛泽东急于搞社会主义，而是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决定的。只不过这些变化蕴含的历史机遇被毛泽东敏锐捕捉到了，他迅速改变了原先的考虑，后由党中央集体一致作出了决策。

任何事情有一得必有一失，有一利必有一弊，关键看得大还是失

大，利大还是弊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国有化、集体化，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等于原先面对的经济基础薄弱、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实际情况随之改变了。既然这些问题依然存在，那么，要把有限的资金、物资、人才都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势必造成物资特别是粮食供应的紧张，势必牺牲人民的一部分消费，使生活水平提高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对这些问题，当时的领导人都预见到了，也指出来了。例如，毛主席在1953年就说，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刘少奇早在1950年论述为今后重点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的办法时就指出："要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就不能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是说，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这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创造劳动人民将来更好的生活，在将来能够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人民节省下来的资金不是用来满足剥削者奢侈的生活，更不是用来满足政府办事人员的腐化生活，而主要的是用来满足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29]周恩来在1954年说："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30]陈云在1954年也说，减少消费，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在两者中间选择一个：或者是暂时减少可以减少的消费，以便完成国家工业化；或者是尽其所有在国内消费掉，因而不能建设工业，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全国人民自然应该选择前者，不应该选择后者。"[31]

另外要看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高度公有化本身，在信息反馈手段落后的情况下，势必影响生产的灵活

性、丰富性，以及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加之缺乏经验，这一切更会在实际工作中造成种种被动。为了尽可能减少弊病，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也想过一些改进的办法，比如，提出“三为主、三为辅”的体制改革设想和按照农轻重顺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张。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设想、主张在当时要么未能付诸实施，要么实施起来也不够坚决。直到70年代末，我们才通过改革开放，最终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和过于突出重工业的发展战略。

不过，尽管当年由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弊病，尽管当年设想的一些克服弊病的措施未能实施或未能很好实施，但就这一决策利弊的整体权衡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理由有以下四条：

第一，正是由于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我国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仅用20多年时间就建立起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大大缩短了工业化进程，为后来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国建立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虽然是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但其基础主要是那个时候由苏联援建的“156项”打下的。直到今天，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没有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所谓“156项”，实际实施的是150项，其中航空工业12项、电子工业10项、兵器工业16项、航天工业2项、船舶工业4项、钢铁工业7项、有色金属工业13项、化学工业7项、机械加工24项、煤炭工业25项、电力工业25项、石油工业2项、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项。正是这些项目，奠定了我国比较完善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了建立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制造业之所以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与那些年打下的底子有很大关系。根据联合国对产业的分类，全部工业大类中有39个门类，

中类中有191个门类，小类中有525个门类。所有这些门类，我国现在全都拥有，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全都拥有的国家。如果我们那时未能抓住机遇，未能从工业化建设起步时就把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奋斗的目标，恐怕今天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第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与原来先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党中央原来设想先搞10年或15年新民主主义，然后用一个早晨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0年或15年过渡完相比，不仅在最终目标上没有差别，而且在时间上的差别也不大，都是10年到15年。至于后来在实行总路线的过程中，过渡时间被一再提前，其中有客观形势变化的原因，也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在起作用，与提前过渡的决策本身没有关系，应该另当别论。

第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为我国抓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我们今天都知道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道理，当年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个机遇不是别的，正是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发展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虽然也有保留的地方，但总体上是真诚的。放眼世界历史，过去还没有哪个工业国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采取过如此全面援助的做法，今后恐怕也不会有。当年负责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就说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32]"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33]我们还应当看到，既然是机遇，就有可能稍纵即逝。事实也说明，1960年赫鲁晓夫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召回专家，撕毁合同，那个机遇期就结束了，前后不过七八年时间。

第四，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改革开放后有一种说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意思是说，既然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何必当初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种观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新民主主义当成了一回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仅以土地制度为例，新民主主义时期是允许私有的，在城市，私人房产有地契；在农村，土改后个体农民的土地是私有的，即使初级合作社，土地也是入股的，按股分红。社会主义改造后，在城市，土地一律收归国家所有；在农村，土地一律归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改革开放后，城市落实政策，凡私人合法拥有的房产一律返还，但只给房产证，没有土地证，土地所有权仍然归国家，房地产开发商取得的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地租期最长不过70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但只有承包权，承包权虽然可以流转，所有权却仍然归村集体所有。可见，认为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于回归新民主主义，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还应当看到，正是由于那时完成了土地资源的国有化和公有化，土地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的经济奇迹中，才发挥了极为显著也是其他国家至今难以企及的作用。

综上所述，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不是什么失误，而且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华民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工业化建设跨越式发展抓住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不仅不是什么"走了弯路"，而且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抄的一条近路。

2. 运用关于研究和宣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历史要牢牢把握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思想，批判夸大党史国史中缺点、错误并以偏概全的种种谬论。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鼓吹者欺骗群众的惯用手法之一，是抓住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存在的某些缺点、错误，或无限夸大，或以偏概

全、以管窥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目的就是使人忽略事物的本质和主要方面。

2010年，习近平同志就如何研究和宣传党和国家历史的问题，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他具体说了五个“揭示和宣传”和一个“坚决反对”，即要“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34]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就是指我们党在中国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的形成，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伟大复兴这三个社会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辉煌成就，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只要拿这些胜利、成就、经验和传统、作风同我们党的缺点、错误，同党史国史中的挫折、曲折放在一起比较，什么是主流和本质，什么是支流和现象，就会一目了然、一清二楚。

对于用个别例子代替事物本质的做法，列宁曾作过深刻批判。他说：“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35]“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

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36]

我们主张把握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线、主流，不是为了回避党的缺点、错误和党史国史中的挫折、曲折。否定客观存在的错误，掩饰错误，为错误辩护，甚至把错误说成正确，那同样是不对的。现在还有极少数人鼓吹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甚至为林彪、“四人帮”翻案，那更是荒谬的、不得人心的。但我们正视错误的目的，应当像习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意在“总结和汲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37]只要这样做，就不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一般说来，改革开放前的一些重大失误、错误，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具有时间长、全局性的特点。但即使对这样的失误、错误和因此遭受的挫折、曲折，我们在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时，也应当采取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态度，不能以偏概全。

第一，要区别失误、错误是普遍的全局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改革开放前曾发动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中，像“大跃进”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文化大革命”之类“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错误，都是普遍的全局性的。但像新解放区土改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错误，则是个别的或局部的，而且一经发现很快得到了纠正。如果不加具体分析，看到哪个运动中有缺点有错误就予以全盘否定，势必会得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是一连串错误集合的结论。

第二，要区别失误、错误与失误、错误中存在的正确的合理的成分，以及这些成分对以后工作起到的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几场比较大的批判运动，存在把思想性、学术性问题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但也应当看到，正是那些大张旗鼓的批判，加上同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原先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

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和迅速清理；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民服务和人人平等等无产阶级思想，很快被大多数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如果不加具体分析，把那几场批判运动所犯错误连同其中合理的正确的成分一概否定，就难以解释过去仅在农村根据地、解放区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短短几年内能在全国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等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列宁说过，不能在倒婴儿洗澡水时连同婴儿一起倒掉。在批判、纠正过去的错误时，同样要防止这样的现象。

第三，要区别失误、错误与出现失误、错误的时期。“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害，但前前后后持续了三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例如，发动群众大兴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兴建水库和水利设施。据统计，我国至今拥有的8万多个水库，近一半是在那个时期兴建的。那一时期兴起的县办社办工业后来虽然由于原材料不足等原因纷纷下马，但后来有很多得以“复苏”，为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打下了基础。在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们又扩建、新建了包括武钢、攀钢在内的十大钢铁厂，以及一批有色金属冶炼厂和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就连大庆油田也是那一时期被发现和开始建设的。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立后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但它持续了10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做了许多其他有益的工作。《历史决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例如，建成了成昆、湘黔、焦枝等9条铁路（其中包括宝成电气化铁路），南京长江大桥，两条长距离输油管道和连通大部分省的微波通信干线，第一艘核潜艇，第一个卫星地面

站，第三代电子计算机，全国电视网；成功爆炸了氢弹，进行了地面核试验，发射和回收了人造卫星，发射了第一颗洲际导弹，成功培养了籼型杂交水稻，等等。就连2015年因为发明抗疟药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国家下达任务，领导实验室开展研究而取得成功的。《历史决议》还说：“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38]这说明，我们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简单画等号，不能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党和政府做的全部工作和建设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社会的原有性质。

第四，要区别在当时可以避免的失误、错误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失误、错误。所谓可以避免的错误，就是根据主观认识能力及客观具有的条件都不应当犯的错误。所谓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错误，一种是实践不够、缺少经验造成的；一种是物质不够、缺少基础造成的。例如，改革开放前在很长时间内积累率过高，对消费品生产的资金、原材料安排不足，给人民生活造成一定困难，尤其是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变化不大。这有我们对积累与消费比例安排不当，对农业与农民照顾不够的一面，也有新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不得不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最大限度地集中用于工业化基础建设，从而不得不适当抑制消费、维持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大是为工业化建设付出的必要代价。至于后来统购物资越搞越多，票证越发越多，更多是与我们主观上犯的错误有关，如“反右倾”和搞“文化大革命”等。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一句话，叫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有人说，这句话中的“老路”，指的是改革开放前走的路。笔者认为这种理解不对，起码是不全面的。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很长时间里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国在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同时，仍然千方百计地在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农副产品、轻工业品、工艺品，以换取硬通货。1949年，我们之所以不急于收回香港，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如果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经济封锁，可以把那里作为内地同西方世界进行贸易的、换取硬通货的渠道。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39]可见，“封闭僵化的老路”，主要是指“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特别是“四人帮”把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统统斥为“洋奴哲学”，使我们形成了自我封闭的那种状态。而且，还应当看到，即便在那个时期，毛泽东仍然批准了用43亿美元引进西方冶金、化纤、煤矿、化肥等22个现代化大项目的“四三方案”，所用外汇远远超过“一五”时期从苏联的引进规模。这些项目1982年前陆续投产，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改革开放前虽然存在“封闭僵化”问题，但不能把改革开放前走过的路说成是“封闭僵化的老路”。

第五，要区别失误、错误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以及好心办坏事和个人专断。改革开放前犯的错误中，有经验不足的问题，也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不够端正的问题；在方法和作风问题中，有急于求成造成的，也有个人专断造成的。对急于求成的毛病，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40]

对个人专断问题，《历史决议》作了深入分析，指出根源在于骄傲，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社会原因是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缺少制度化、法律化，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历史原因是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必须看到，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思想作风问题，后者是社会性质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因为存在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现象，就妄言我们党是什么专制主义的党，我们国家是什么专制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与个人专断之类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并着手纠正这种现象。另外，对于历史原因造成的错误，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重要的是总结经验，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不能搞一言堂甚至家长制"。这说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有其悠久历史渊源，不会只在某个人或若干人身上起作用，也不会仅在短时间内就被清除干净。

我们主张把握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线、主流，不是说我们现在一切都做得很好了。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各方面工作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我们的治理体系还没有达到成熟和定型的要求，有些地方还在制约我们的发展和稳定。但是，历史已经说明并将继续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上是成功的，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总体上也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国不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而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这说明，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路。只有看清这一点，我们才能树立信心，坚定方向，才不至于受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东倒西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说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41]

在这个问题上，有些旁观者比起我们中的某些人，反而看得更为客观。比如，《大趋势》的作者、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就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局面，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模式来挑战西方民主政治。"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也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让发展中国家收益巨大，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被很多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发展模式、对外政策，会在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并引发共鸣。他们的评论，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正是我们党史国史的主流。

3. 运用关于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思想，批判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加以割裂和对立的种种谬论。

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是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为了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喜欢做的又一篇文章。人们只要稍加注意就会看到，凡是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必然会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新民主主义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往往会把两个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同样，凡是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

裂、对立、相互否定的，也必然会反对或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事实说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一个与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相关的问题。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根本制度究竟变没变？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一五”讲话中曾给过十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42]这清楚地告诉人们，改革开放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性质和根本制度。

在那次讲话中，习总书记还用很长篇幅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提出了三个具体论点和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是，如果没有一九七八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同时，如果没有一九四九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

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二是，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

“三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43]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四个要点：第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确实有很大差别；第二，党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进行的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社会的根本制度是一样的，相互关系是内在一致的；第三，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则使中国避免了苏东剧变那样的危机；第四，绝不能将这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对立，而应当把它们看成坚持与被坚持、发展与被发展的关系。

习总书记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由于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说理透彻，所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同，同时也戳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

习总书记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

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44]。就是说，这是一个涉及政权安危的问题。我们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必须紧紧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大张旗鼓地宣传、阐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一致性，引导广大群众、青年学生识破将它们加以割裂和对立的荒谬性、危害性。只有这样，才能帮助群众树立对新中国的历史自信。有了历史自信，才能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否定改革开放前历史的一个手法，是拿那段历史的发展同发达国家相比，而无视新中国的建设是在旧中国百孔千疮、一片废墟的基础上，以及在帝国主义军事包围、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的环境下进行的事实。国庆60周年前夕，有一家报纸开辟了一个庆祝专栏，打头的文章声称，改革开放前，我国发展不仅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估计，作者很可能是在拿我国内地（大陆）和所谓“亚洲四小龙”比。如果这样比，那是很不科学的。陈云1978年曾说过：我们不能同日、德、英、法比，“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45]。就是说，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搞工业化比我们早得多，韩国、台湾地区等所谓“亚洲四小龙”，都不搞工业体系。而工业体系对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来说，远比加工工业重要得多。如果不是和它们比，而是与处在同样发展水平的第三世界国家比，与各方面和中国差不多的发展中大国比，特别是拿基础工业比，那就会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发展速度不仅不慢，而且快得惊人。

比如，拿新中国和印度比。中印两国都是古老国家，都是人口大国，过去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完全独立的时间也差不多。在一定程度上，20世纪中叶的印度比中国基础工业还要强一些。先说铁路，

1949年中国只有2万公里，而印度已有5万公里，是亚洲第一，双方相差3万公里；但是到了1978年，中国增加到5万公里，印度增加到6万公里，双方只差1万公里（到2017年，中国增加到13万公里，而印度仍不到7万公里，中国超过印度约一倍）。再说钢产量，中国1949年是印度的四分之一，而1979年已是印度的1.17倍（现在是印度的9倍）。这说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中国，比资本主义印度的发展速度要快得多。

即使拿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工业品产量方面，差距也不是在扩大，而是在明显缩小。例如钢产量，1949年至1979年，新中国由15万吨提高到3200万吨；与英国比，由相差99倍变为反超60%；与美国比，由相差438倍变为相差3.6倍。再如发电量，同一时间，新中国由43亿千瓦小时提高到2566亿千瓦小时；与英国比，由相差13倍变为反超17%；与美国比，由相差80倍变为相差9倍。再如石油，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年产量从旧中国最高年份的32万吨提高到1亿吨，做到了自给自足，而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中，除了美英两国外，还没有哪个国家达到年产石油1亿吨。

习近平总书记每当回顾新中国历史时，总是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前取得的伟大成就。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46]

根据历史事实和党中央的评价，笔者认为可以把改革开放前为改革开放奠定的基础、积累的条件概括为以下五条。

第一，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前提。例如，取得了国家独立、统

一，实现了民族大团结，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例如，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固定资产增长了56.3倍，许多工业产品的产量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日渐缩小，培育并形成了各领域庞大的人才队伍（科技人员1952年42万人，1978年434万人，增长约9倍），产生了一批世界瞩目的高科技成果，大大延长了人均预期寿命，使人口翻了一番、劳动大军增加了一倍。

第三，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外部条件。例如，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开辟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第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保证。例如，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基本政治原则。

第五，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说过："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47]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的书，作者朱云汉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蒋经国基金会秘书长。他在书中对中印两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发展情况做了具体对比，对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有很大帮助。书中写道：

"195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几乎处于相同的贫穷与落后状态，但经过一甲子之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列的'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所有指标上，中国的长期表现明显优于印度。2011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仍未达到中国1990年的水平，2013年印度成年人

平均受教育年数仅仅与1985年时的中国相当。在民众的健康、卫生和平均寿命等各种指标上，印度落后中国的幅度都超过20年。两者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规模上的差距，更是日益扩大。1991年印度的名义GDP为2900亿美元，中国是4150亿美元；2001年，印度达到4980亿美元，中国则为13240亿美元；2013年印度为1.8万亿美元，中国则突破了9万亿美元，差距拉大为四倍之巨。”[48]

对于中国比印度发展速度快得多的原因，书中提到了发展模式的作用。朱云汉写道：“中国发展模式得力于三个特殊条件：第一是特殊的政治体制，第二是充分发挥‘大’的优势，第三是在全球化时代发挥了‘后发优势’。很多研究中国发展经验的学者，都忽视了特殊的政治体制带来的优势。一般流行的看法都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前面30年都浪费掉了，走了很长的冤枉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黑暗时期’。这个认知并不正确，至少是以偏概全。客观来说，这个时期不完全是白费，中国在这个时期以极为高昂的社会代价，牺牲了很多人，建构了日后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会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49]

在将中国和印度的政治体制作了一番比较后，朱云汉指出：“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达到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与工业资本国有化或集体化。除了农村土地外，这个庞大国家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这成为中国后来30

年快速发展的资本。其他很多国家没有走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很难复制这个历史条件。”[50]

朱云汉的观察和评论，显然比内地许多所谓“公知”要客观、公允得多，也深刻得多。

4.运用关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思想，批判所谓“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等谬论。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是否定革命、“告别革命”，它的所有观点及种种言论，包括谣言，几乎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前一阶段流传两种说法：一是把我们党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偷换为对时代性质的认定，提出“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二是把我们党已经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变成长期执政党的事实，演绎为“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之所以故意混淆时代特征与时代性质的区别，说什么现在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就是为了证明革命已经不合时宜了，以此推销“告别革命论”，达到让我们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目的。可见，当今时代究竟是什么时代的问题，是与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不要坚持革命、要不要继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密切相关的问题。

关于当今时代的性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党的十八大过后不久便作出了明确论断。他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51]2017年9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更加明确地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52]这就告诉我们，人

类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如果说当今世界已进入和平和发展的时代，那么，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以及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岂不都失去了时代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科学研究，指出人类历史用社会形态来划分，大体要经历原始社会时代、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和共产主义时代，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自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20世纪初，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考察，指出这一社会制度已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人类历史因此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验证了马克思、列宁的科学预言；这两场革命胜利后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时代，少则数百年，多则上千年。因此，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会面临不同的时代课题，呈现不同的时代特征。20世纪上半叶，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世界的矛盾加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那个时期的时代最强音。列宁据此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战争中解救出来。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毛泽东从这个实际出发，对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作出了与列宁类似的估计，即“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

争。”[53]可见，在列宁和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时期，时代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特征，都是战争和革命。

然而，自20世纪进入下半叶开始，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通过民族民主运动，纷纷实现了国家独立，争取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它们的迫切要求；同时，核武器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势的出现，在客观上削弱了战争的危险性。所有这一切，促进了世界和平势头的上升。其次，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自我调整，起到了缓和它们国内阶级矛盾的作用，促使革命形势有所低落。最后，7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的以布雷顿森林条约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废除国家汇率制、允许资本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以发展金融、高科技等服务业而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结构调整，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从发达国家引进外资和先进设备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加剧了它们同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博弈。所有这一切，增强了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的呼声。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邓小平作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两个主要问题的论断。他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54]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论断，我们党把和平与发展陆续概括为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两大主题、两大课题和时代特征。

我们党改革开放后对时代特征的新判定，是否意味着对时代性质的看法也跟着发生变化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对此，只要看看以下事实就清楚了。

第一，我们党的正式文件及领导人讲话虽然没有直接说过当今仍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或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党改变了马克思列宁对时代性质的论断。例如，邓小平在1979年说过：“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

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55]1989年他又说：“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欺侮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常干预这些国家为摆脱控制、发展经济、争取政治独立与自主所作的努力。”[56]“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57]如果说今天不是帝国主义时代而是什么和平与发展时代，怎么还会有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呢？

第二，我国随着全方位外交的展开，在公开场合很少再使用帝国主义的概念，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党改变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历史决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所得出的十条经验中，关于对外关系仍然强调：“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58]邓小平说：“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59]他还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宣布制裁中国，他们这一套是“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60]这里说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显然指的就是帝国主义。我们党此后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讲到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实际上也都是讲要反对帝国主义。

第三，战争和革命已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党改变了对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看法。只要翻阅邓小平著作就会看到，他总是提醒我们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要保持警惕，要通过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来维护世界和平。他指出：“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61]“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62]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再像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初期那样，采取直接的军事干涉的方式，但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挑衅，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政权的武力颠覆，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谁都明白，今天中东的

战乱，东海、南海、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根源究竟来自哪里。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加强海外军事基地建设，加紧研制和部署新式武器，扩大北约势力范围，打造亚洲版的“北约”，所有这些不是为发动战争做准备或进行战争讹诈，又是为了什么呢？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说过：“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6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不断强调要加强军事斗争的准备，显然也是从战争危险依然存在这一事实出发的。

第四，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侵略的一面有所收敛，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党改变了对它们颠覆、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的警惕。“八九”风波之后，陈云曾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64]时隔八天，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指出：资本主义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现在搞和平演变。他还说过：“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65]可见，我们在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绝不能放松对帝国主义通过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手段进行渗透、分裂、颠覆活动的警惕。

第五，自从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了信心。革命低潮不等于革命终结。事实一再说明，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没有消失，而

且还在继续发展。首先，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仍然在不断壮大，至今已拥有近9000万名党员。除了中国，还有一些国家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100多个国家的130多个工人阶级政党、合计约1800多万名党员，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其次，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虽然不如20世纪初期、中期那样高涨，但抗议资本家剥削的罢工、游行、示威遍布欧美，此起彼伏（例如，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1%VS.99%”的标语，时间持续两个月之久）。最后，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实力的削弱，发展中国家反对发达国家经济侵略、政治干涉、文化渗透的斗争也在不断发展。这些动向加在一起，可以看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受住了考验，正在逐步走出低潮。回顾当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有过低潮，甚至有过多次低潮，但每次低潮过后都迎来了高潮，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今天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依赖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用以缓和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势必不断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阶级矛盾势必不断加剧。到一定时候，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同样会由低潮走向高潮。

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说得好：“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66]

总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没有改变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

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总趋势，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性质。我们毫无疑问要继续坚持对时代特征的判定，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紧紧抓住和充分利用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加紧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为赢得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必须保持对时代性质的清醒认识，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弄明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依据，才可能真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提出“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同样是为了忽悠我们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这种说法的要害在于通过歪曲革命的含义，把革命与执政加以割裂和对立。常识告诉我们，“革命”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并不完全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革命”这个词，有时指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如革命精神；有时指某一领域出现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有时指重大体制、机制上的变革，如说改革也是革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相对于既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来说，更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行动。组织和建设新的社会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同样也是革命。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其革命任务就完成了，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夺取政权仅是革命的第一步。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并解释说：“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67]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68]他所说的革命，显然指的就

是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要不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说法之所以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欺骗性，原因在于它利用了我们党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否定。然而，那个理论中的“革命”，特指在无产阶级已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仍然要进行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这种“继续革命”的理论当然是错误的，应当否定，而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被否定。但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否定这种特定含义的“继续革命”，并不意味着否定了本来意义的继续革命。对此，《历史决议》曾用很大篇幅作过专门论述。它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69]可见，我们党从来没有因为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就认为革命的任务完成了，不再需要继续进行革命了。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一段话，说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能不能从这段话中推导出我们党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不再需要革命了

呢？照样不能。首先，说掌握全国政权也好，领导国家建设也好，这对我们党来说都是新阶段的革命任务。就在那句话后面，十六大报告接着指出：“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说党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再革命了，那“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的又是什么呢？其次，政党本身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任务是带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如果说革命结束了，党本身岂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只要党还存在，就说明革命任务并没有最后完成。最后，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在讲到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时，都提到了军队的革命化建设，十八大报告还要求“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人民军队是由我们党领导的，如果军队仍然是革命军队，仍然要进行革命化建设，那么怎么能说领导它的党反而不是革命党了呢？这在逻辑上也说不通。尤其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延续了“革命军人”的提法，而且提出了“革命文化”的概念，指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因为夺取了全国政权，解除了外部封锁，党就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一样了，用不着革命了，那为什么还要提“革命文化”呢？这也是难以解释的。

“告别革命论”以及要求“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主张，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更是十分有害。它很容易造成把我们党的执政混同于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后果，使我们党丢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革命传统、革命作风、革命精神，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导致脱离人民群众，最终亡党亡国。近些年，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和党风中发生严重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败问题，与这种主张的散布不能说没有关系。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70]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中也引用陈云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所说的"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话，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还不无针对性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71]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时他又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72]他们的话都表明，我们党执政后仍然是要继续进行革命的。这个革命不是别的，就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说，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这里说的时代性，笔者理解应当是指时代性质与时代特征的统一。就是说，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性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特征，共同构成了当今时代的内涵。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处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要讲政治讲原则，仍然要战斗要革命。至于说我们党现在究竟是革命党还是执政党？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准确的回答应当是：既是执政党又是革命党，是革命的执政党

或执政的革命党。

5.运用关于对革命领袖的失误、错误要采取郑重态度以及要崇尚英雄、捍卫英雄的思想，批判污蔑、诋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和抹黑、丑化革命烈士、英模人物的种种谬论。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之所以总是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对准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对准为革命胜利牺牲生命的烈士和为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的英模人物，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否定了革命领袖、革命烈士、英模人物，也就否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明确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7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一五”讲话中引用了这段话，并紧接着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74]他反复强调：“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75]他还多次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76]

习近平总书记的以上论述，是我们正确看待革命领袖、革命烈士、英模人物的指导方针，也是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攻击、污蔑毛泽东的一个主要手法是抓住他

晚年的缺点、错误大做文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并没有回避，而是从正面回应，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以此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谬，争取广大群众的认同。

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习总书记是这样分析的。他说："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77]

对于应当怎样正确看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习总书记也作了深入分析。他说："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78]"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79]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错误，是轻率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对此，《历史决议》指出了三条原因：第一是国家经济文化太落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第二是全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第三是毛泽东主观上急于求成，并且说，急于求成不止他一个，还有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对于急于求成，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曾作过分析，指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

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80]上述分析也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毛泽东晚年错误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晚年另一个严重错误是轻率发动“文化大革命”。对此，党中央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看法。邓小平在被誉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那篇重要讲话中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81]《历史决议》一方面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又指出，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历史决议》还指出，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82]

关于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历史决议》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83]

习总书记除了从正面分析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之外，更多的则是阐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高度概括了毛泽东的功绩，说他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且“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84]。

对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贡献，习总书记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85]

对于毛泽东思想，习总书记是这样说的：“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86]

对于毛泽东的光辉一生及其历史地位，习总书记是这样评价的：“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87]“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88]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烈士、民族英雄的种种污蔑，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号召全社会要铭记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形成崇尚英雄的良好氛围。他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89]“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90]他还针对社会上一些不尊重英雄的现象指出：“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91]

习近平总书记这些充满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精神的论述，高屋建瓴、义正辞严。只要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鼓吹者对毛泽东和其他革命领袖、英模人物的种种攻击，放在这些论述面前，便会显出其色厉内荏、苍白无力的实质。这一事实再次说明，唯物史观是观察和认识历史问题的显微镜、放大镜，也是一面照妖镜，一切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论在它面前都会原形毕露，丑态百出。

[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页。

[3]《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页。

[4]《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427页。

[5]《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1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9、800、80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1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5页。

[14]《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0～691页。

[16]《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4～655页。

[1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5页。

[19]《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0]《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1431页。

[22]《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23]《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24]《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6日。

[2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第534页。

[2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28]《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29]《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176页。

[30]《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134页。

[31]《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3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3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

[34]《人民日报》2010年7月22日。

[3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8页。

[36]《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37]《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3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6～817页。

[3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40页。

[41]《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4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0页。

[4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

[4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114页。

[4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46]《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4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48]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

[49]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

[50]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

[5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52]《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5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5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5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5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5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5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3页。

[5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6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6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6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6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6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页。

[6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6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67]《学习时报》2015年9月7日。

[68]《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69]《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4～845页。

[7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71]《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11期。

[72]《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7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7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75]《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76]《人民日报》2015年9月3日。

[7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3页。

[7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3页。

[7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3页。

[8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40页。

[8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8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4～815、816页。

[8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7页。

[8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9～690页。

[8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1页。

[8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2页。

[8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2页。

[8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2页。

[89]《人民日报》2015年9月3日。

[90]《人民日报》2016年2月3日。

[91]《人民日报》2018年3月13日。

三 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精神把握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中的几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1]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便属于这种软实力的较量。就是说，我们同这股思潮之间的较量，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不是学术领域的争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应为"拼"。——编者注）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2]事实说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制造者和鼓吹者中的骨干分子，就是这种不拿枪的敌人。我们必须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既然如此，同这股思潮作斗争必须讲究斗争的战略、战术和方式、方法。联系当前实际，笔者认为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需要通过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1. 要敢于亮剑

对于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的人，我们当然要通过摆事实讲道

理，心平气和地做思想转化工作，帮助他们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然而，对那些别有用心起劲鼓吹这股思潮的“骨干分子”，特别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种“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人，就不存在什么做思想工作的问题，而是要敢于亮剑，正面交锋，进行坚决斗争，“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3]。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4]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5]他说：“现在，国内国外、网上网下都有一些言论，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些就是负面能量，增加正能量就要对负能量去有的放矢，正面交锋。”[6]他尤其强调，领导干部不能搞“爱惜羽毛”、“故作开明”、左顾右盼、上推下卸那一套，也不能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等理由替不作为开脱，更不能在有人同这股思潮做斗争时袖手旁观，甚至“拉偏架”，听任错误的反动的言论畅通无阻、大行其道、自由泛滥。他批评说：“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7]他告诫人们：“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8]“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9]他要求有关部门的领导：“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图书、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

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10]

前些时候，有人以邓小平讲过“改革不问姓资姓社”“不搞争论”为借口，主张在改革方向的问题上也不问“姓资姓社”，也“不搞争论”。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肆意歪曲。邓小平说过不问“姓资姓社”“不搞争论”，但那是针对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讲的。只要看看《邓小平文选》就会清楚，在改革方向问题上，他不仅从来没有说过不问“姓资姓社”“不搞争论”，相反，总是提醒我们要“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1]“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2]他说：“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13]“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14]在改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他甚至还直接说过“要继续争论”这句话。他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5]

对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同样表示过十分明确的态度。他指出：“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16]

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对宣传工作、对理论界和文艺界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力的现象提出过严肃批评。他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17]“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

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18]“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19]他还指出：“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一些错误倾向是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只是效果不够显著。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如果自己有错误，就要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并且切实改正。谁要是坚持错误不肯改正，就不能担负思想工作的领导责任。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20]

对于如何看待“不争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过一些十分精辟的阐释。他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21]“对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敢抓敢管，对出现偏差和错误的要严肃批评、严肃处理，对发出正义声音而受到围攻的媒体和

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坚决力挺。”[22]“别人乱说我们一通，如果我们不及时加以澄清和纠正，就会以讹传讹，反倒让世人觉得我们输了理似的。我们要主动发声，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的党员、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软，不要听风就是雨。同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23]为了说明对错误的东西要敢于发声，他还引用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24]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强调：“对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立场、没有态度、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在错误言行面前不抵制、不斗争，明哲保身、当老好人等政治不合格的坚决不用，已在领导岗位的要坚决调整，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25]可见，在意识形态领域借口“不争论”而回避斗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反复强调对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要“敢于亮剑”，缘于对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冲破了，其他防线很难守住。”[26]“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

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27]为此，他总是要求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指出：“党校必须姓党”。“党校要旗帜鲜明、大张旗鼓讲马克思主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旗帜鲜明、大张旗鼓讲党的性质、讲党的宗旨、讲党的传统、讲党的作风。”[28]他还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29]

现在有人反对“党媒姓党”的科学论断，说什么人民性高于党性，党媒首先应当“姓人民”。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无知，更是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颠倒。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30]“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31]我们要正确认识“党媒姓党”的问题，同样离不开阶级分析。

在阶级社会，人民内部是分为不同阶级的，而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党性来自特定政党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阶级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因此，共产党的党性必然来源于并高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性。然而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工人阶级既与最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又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因此它只有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彻底解放自己。这就决定了共产党既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利

益，同时也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一个共产党员只有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提到党性高度，他才能同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也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当我们说“党媒必须姓党”时，实际上是说党媒必须首先具有党性，才能真正具有人民性；我们说“党媒要做党的喉舌”时，实际上是说党媒必须首先代表党说话，才能真正代表人民说话，才能成为人民的喉舌。这个关系不能颠倒，否则就混淆了人民、阶级、政党的关系，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就会被一些人用来浑水摸鱼，打着“人民性”的幌子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先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然后强调党的新闻媒体“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32]这正是对党性与人民性、党的喉舌与人民喉舌相互关系的准确阐释，不仅完全合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那些反对“党媒必须姓党”的声音，不就是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了吗？他们撇开“党性”，只让媒体“为人民说话”，其实不过是拿“人民”当招牌，骨子里想的是让媒体代表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和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势力说话。可见，赞成还是反对“党媒姓党”，实质不在于“党媒”要不要代表人民说话，而在于“党媒”要代表人民中的哪一部分人说话，是代表绝大多数人说话，还是只代表其中少数人说话。

习总书记在那次讲话中还要求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增强看齐意识，这就是说，媒体在道路、方向、目标和大政方针上要向党中央看齐，在思想上政治上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要求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也是媒体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我们党的纪律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党的媒体当然不能例外。这就像交响乐队一样，所有乐器只能以第一小提琴手的声音定调，否则就要乱套。由于媒体

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影响力，所以更要以党中央的声音定调，更要把音调定准，绝不能有丝毫跑调。就是说，音调既不能低，也不能高，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要做到这一点，“党媒”的领导权就必须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在我们国家，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媒体中的主体，只要这部分媒体真正做到“姓党”，增强看齐意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地盘自然会被大大压缩。

2. 要依法斗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近年来之所以在我国迅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技术发展快而网络管理意识和手段相对滞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33]他反复告诫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34]因此，我们要打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进攻，必须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现在，我国网民有7.5亿人，手机网民有6亿多人，其中微博用户达到4亿多。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大部分信息从网上获取。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互联网战场上的主动权，绝不能被边缘化。

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党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国家实行的一个原则。因此，互联网中涉及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内容，自然要由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监管。这种监管是党管宣传舆论工作的体现，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体现。网络监管当然要依法进行，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体现的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禁止

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国有关网络管理的法律对于网络上有损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必然会严加禁止。

邓小平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35]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这样的行为泛滥开来。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36]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37]这些话表明，看待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问题，同样离不开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现在有人一方面在网上疯狂攻击共产党、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英雄模范、歪曲党史国史，另一方面又指责网管部门加强网络管理侵犯了言论自由。我们应当针锋相对，分析什么叫言论自由，讲清楚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抽象的绝对的言论自由，帮助群众正确看待网络管理的问题。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必须加以保障，包括保障错误言论的自由。不允许人说错话，不仅谈不上人民民主，也谈不上党内民主。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有过教训，应当汲取。但我们同时也要明确，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绝对的自由，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是无边无际的。

网络是新媒体，是虚拟空间。但只要是媒体，就会产生社会作用，就不能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表言论，同样要受到法律、党纪、道德的制约。

首先，公民的言论自由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刑法》规定，不得煽动分裂破坏国家统一；不得以造谣、诽谤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不得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其他物品，或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不得诬告、陷害他人；不得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不得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不得在战时造谣，扰乱军心，否则要受法律的惩处。

其次，8900万共产党员的言论自由要受到党纪的制约。2015年10月修订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章“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中规定：“凡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的；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的，都要视情节予以相应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重申：“党员不准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准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的言论，不准泄露党和国家秘密，不准参与非

法组织和非法活动，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38]最近，中宣部、中组部、中央网信办又联合印发《关于规范了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党员干部不准参与的网络传播行为和不得参加的网络活动，并要求必须以职务身份注明账号、建立群主。这些都是对党员言论的约束。

最后，言论自由还要受到道德的制约。无论任何人通过任何媒体发表造谣惑众、辱骂他人、伤风败俗的言论，都要受到舆论的谴责，承担由此造成的社会后果。

可见，所谓言论自由，是指在法律、道德允许范围内的自由；对共产党员来说，还要加上党的政治纪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其实，即使在西方，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英国19世纪哲学家穆勒就说过：“约束是自由之母。个人的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在欧洲一些国家，现行法律严禁宣扬纳粹的言论，违反者要被判刑、坐牢。那种认为言论自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想说什么说什么的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制造者、鼓吹者为蒙蔽群众而故意散布的谎言。

关于如何看待言论自由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讲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话。他说：“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之中，对那些五花八门、纷繁杂乱的人散布的言论，必须保持高度警觉。现在，社会舆论环境十分复杂，各种言论甚至谣言、传言很多，特别是网上各种言论很多，有各种敌对势力故意制造的言论，有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不满发表的言论，也有一些人对一些事情认识模糊发表的言论。其中，对各种敌对势力公开或隐蔽散布的言论，尤其要保持政治上的警戒。”[39]

应当看到，在当前西方反共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打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战场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打仗要用武器、弹药，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武器”“弹药”的载体基本上都是言论。造

谣、诽谤、编造歪理邪说，报刊、书籍、舞台、电影、网络，都离不开言论。所以，一定意义上讲，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互联网上的斗争，主要就是言论之间的斗争。国内外敌对势力之所以喜欢拿“言论自由”说事，说穿了，就是为了给他们打“没有硝烟的战争”做掩护。

现在有些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提出要“反思文革”，还煞有介事地说要防止“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其实，他们的所谓“反思文革”，无非是要借机掀起一场攻击共产党的浪潮；所谓防止“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无非是以此为借口，阻止我们依法处理少数腐败分子和惩治为西方势力服务的所谓网络大V，阻止纠正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阻止解决分配差距过大、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问题。与他们嘴上说的相反，真正想用“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办法煽动群众闹事的，恰恰是他们自己。

对“文革”的教训，我们当然要继续总结，但绝不能用“文革”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办法来总结。凡是稍微关心政治的人都清楚，目前在政界、知识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虽然有，但只是极少数，力量并不强，市场也不大，要重新掀起极左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没有可能。需要警惕的倒是有一些人利用网络、讲座、论坛等平台，采取类似“文革”中“四大自由”的手法，散布流言，蛊惑人心，破坏稳定，以便达到乱中夺权的目的。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指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搞的那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〇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40]他还说过：“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

次‘文化大革命’。”[41]邓小平这些话是针对当时情况讲的，但拿到今天，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于如何看待党员发表言论时必须遵守政治纪律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结合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教训，讲过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他说：“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九十多年历史、连续执政七十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二十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42]苏联共产党的教训是前车之鉴，我们要从中认真汲取教训，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颠覆性的错误。

3. 要保持韧性

当前，一些同志对于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存在两种情绪。一种是看到这股思潮的蔓延，感到有些积重难返了，因而产生消极情绪；另一种态度虽然积极，但总想通过一两次斗争就把这股思潮打退，因而产生急躁情绪。这两种情绪说到底，都源于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背景，以及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缺少足够的认识。

既然是长期斗争，就不能没有斗争的韧性。要具备这种韧性，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修炼。在这三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都有重要论述。

第一，韧性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43]"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44]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缺乏理解，要想具备同历史虚无主义长期斗争的韧性，当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韧性来自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45]2015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讲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问题时又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理想。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是理想信念模糊甚至动摇的一种表现，好像这个东西太遥远，我们也拿不准，所以就不愿提及了。眼前的事情我们看得到，所以敢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敢提，'两个一百年'敢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就能实现了，看的挺准，更敢提。我觉得，作为党章明确规定的内容，作为我们党一贯明确坚持的理想，我们要坚定信念，坚信它是具有科学性的。如果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46]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缺乏必胜的信念，要想具备同历史虚无主义长期斗争的韧性，那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韧性来自对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必将长期斗争的清醒认识。习总书记强调："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47]如果对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既合作又斗争的长期性缺乏清醒认识，要想具备同历史虚无主义长期斗争的韧性，更是不可能的。

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当然不是要我们等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等到经济科技军事上我强西弱的时候才开始斗争。天底下任何胜利，不付出努力，不艰苦奋斗，靠等都是等不来的。我们既要看到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更要看到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必胜性；既要看到斗争中会有阻力、有曲折，更要看到通过斗争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从一定意义上都源于共产党人的韧性。据报道，"八九"风波幕后黑手万润南前一阵子曾在英国说："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环球时报》评论，引自英国《金融时报》）这个话从反面也说明了保持斗争韧性，对于共产党人夺取最终胜利具有多么大的意义。我们绝不能因为斗争的长期性而悲观失望、丧失信心、"刀枪入库"、"解甲归田"；也不要寄希望于一两个回合就"得胜回朝"，更不要奢望"毕其功于一役"。同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就是要有这样的定力才行。

我们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属于软实力的较量，但它到了一定火候，也会显示出"很硬"的一面。比如，在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过程中，这种思潮就起过"很硬"的作用。当年，戈尔巴乔夫之流用所谓"公开性"，在苏联掀起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狂潮，从否定斯大林到

否定列宁，从否定苏共历史到否定苏联历史，从否定十月革命到否定卫国战争，从否定苏联领导人到否定千千万万个苏联英雄，从为斯图雷平翻案到为沙皇翻案，使支撑人民信念的历史观瞬间倒塌，也使支撑苏联的精神支柱顷刻瓦解。

2016年3月，俄罗斯列瓦达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对苏联解体表示惋惜，58%的受访者表示希望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重新归来。[48]同年11月，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进行的民调结果也显示，63%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表示惋惜。该中心在2017年10月的民调还显示，45%的受访者认为十月革命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意愿，而1990年，持这一观点的人仅占36%。[49]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后悔药”。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像布置客厅那样，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一旦改错了，后悔了，要想再改回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可能性。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也不会让我们顺顺当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想尽办法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他们手中的魔笛之一。我们要牢记苏联的前车之鉴，绝不能让那里发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根据中国现有条件，如果发生苏东剧变那样的事，后果不知会比它们严重多少倍。

胜利不能靠坐等到来，和平也不会从天而降。党中央在国际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就是为了尽可能延长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平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而且二者之间相互关联。邓小平曾深刻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

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50]这就告诉我们，国际上的和平一定要争取，但只要国内不乱，外面的任何力量都奈何不了我们。如果自己先乱了，外面的破坏力量一定会进来。对此，只要看看今天的中东就清楚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9月19日会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代表时特别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51]要稳定，就不能让历史虚无主义这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畅行无阻、自由泛滥。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52]这表明，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常言道：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在这个时候，敌对势力越是会加紧进行捣乱破坏活动，我们则越是要头脑清醒，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武器，积极开展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目的就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不让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这股思潮搞乱人心搞乱中国的阴谋得逞，不让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轻易丧失，不让千千万万烈士用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得而复失。我们坚信，只要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就阻挡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相反，注定会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撵得粉碎。到建党一百年时，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我们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是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的。

[1]《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27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4]转引自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见《人民日报》2013年7月22日。

[5]《人民日报》2010年7月22日。

[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9]《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1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16]《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365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2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2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社2017年版，第49～50页。

[23]《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页。

[24]《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427页。

[25]《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

[26]《学习时报》2014年9月19日。

[2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28]《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11期。

[29]《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

[30]《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页。

[31]转引自刘世军《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见《文汇报》2014年6月30日。

[32]《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

[3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8～29页。

[34]《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

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421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36]《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37]《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8]《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

[39]《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41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

[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42]《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43]《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44]《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4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页。

[46]《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38页。

[4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117页。

[48]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见《光明日报》2016年4月20日。

[49]据塔新社报道，见《参考消息》2017年10月13日。

[5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361页。

[51]《人民日报》2017年9月20日。

[52]《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